

访谈

孟捷慕
德里克·莱文

中国民主季刊

第3卷 第1期
2025年1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从接触到竞争： 中美关系的变迁与 未来



孟捷慕



德里克·莱文

编按：美国与西方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奉行对华“接触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定者们说，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助于推动中国在政治上走向开放、自由。然而，迄今中国并没有在政治上变得开放，而且伴随中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的崛起，它在国际的表现也变得让人不安，这一政策的成效因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接触政策是否已彻底失败？西方应如何调整对华战略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德里克·莱文（Derek Levine）博士采访了政治观察家、记者孟捷慕（James Mann）先生。

孟捷慕出版有《中国幻想》（China Fantasy）、《关于面子》（About Face）等关于美中关系的著作。德里克·莱文是纽约城市大学和新泽西理工学院的政治学助理教授。

德里克·莱文（以下简称德）：你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主题是，西方领导人经常淡化甚至忽视中国的高压政策。你能否进一步阐述，在贸易和经济关系的背景下，为什么西方领导人如此不情愿直接面对中国人权记录问

题？

孟捷慕（以下简称孟）：事实上，根据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驻华记者的个人经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当时淡化人权问题，并非主要出于商业利益，而是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当时，美国迫切地需要中国的合作或帮助，特别是在应对苏联问题上。因此，美国在那一阶段淡化了人权问题。

而到了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淡化人权的动机从战略利益转向了巨大的商业利益，特别是中国作为全球最后一个未被充分开发的市场。当美国不再需要中国来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时，对华商业利益开始快速增长，形成了新的、完全不同但同样强烈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推动美国官员继续淡化中国的人权问题。

德：是的，这很有道理。冷战期间有地缘战略考量，中国作为对抗苏联的平衡力量。如今，商业利益成为主导因素。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 14 亿人口，其中超过 25% 已达到第一世界的中产阶级及以上水平，也就是超过 3 亿人口，几乎相当于美国的人口规模，这些人都是潜在的消费群体。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多聚焦于科技领域。在当前中美围绕科技问题的紧张关系背景下，你认为两国在创新文化方面有哪些关键差异？它们在争夺全球技术领导权时分别采取了怎样的方式？

孟：我并非技术领域的专家，但我想说，一方面，美国在通过其教育体系发展新技术和其应用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学每年培

养出大量高水平的工程和科学人才。因此，我认为美国会继续在新产品的研发上保持领先，而中国也完全有能力自主开发出相当多的技术成果。

德：我的理解是，中国创新方面表现并不突出。只有一位科学家将近 10 年前获得过诺贝尔奖。而且，中国的技术基础大多源于对美国技术的窃取。

孟：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也是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的几大失误之一。协议并未解决技术窃取的问题，也没有认真讨论那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是否会被强制要求将技术转让给中国的问题。

德：美国人当时的想法是，他们始终能够通过创新保持优势。尽管可能会向中国提供落后一两代的技术，但美国始终能够超越这些技术，研发出更先进的成果。他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为了获取中国的大规模市场份额。然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企业必须向中国交出技术。

孟：我在 80 年代初期就曾在中国工作。当我回想起当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傲慢态度——认为中国非常落后，无法完成某些技术工作——与今天的现实形成了鲜明对比。我还记得当时在上海有一家麦道公司制造厂 (McDonnell Douglas manufacturer)，他们回到美国时常常嘲笑中国的无能，比如说他们永远不会乘坐中国制造的飞机等等。

德：是的，如果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技术开发方式，会发现当时他们的技术确实达不到国际标准。以 1980 年代制造的运 -10 飞机为例，这是一款模仿麦道 DC-9 的复制品，但只能在空中飞行 30 分钟，甚至发生过中途解体的情况。也因此，没有哪位中国领导人愿意乘坐国产飞机，因为

他们无法保证飞机制造的安全性。

孟：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使在今天，中国仍依赖空客和波音公司，而未能成为全球性的飞机制造商。

德：中国在 C919 飞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其中仅有 30% 的技术是自主研发的，而近 70% 的零部件仍依赖于外国技术。

好的，让我们继续讨论。你如何评价美国对华政策的有效性？你认为美国可以采取哪些不同的措施，在不加剧紧张局势的情况下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孟：你指的是技术领域，还是总体层面？

德：总体层面。

孟：我认为，美国花费了太长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一个重商主义国家，并且有能力彻底改变国际贸易格局。美国本应该早在 15 年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也应该更早认识到技术窃取带来的威胁。我认为过去大约七年间的政策总体方向是正确的。我将这一政策转向的起点归于首届川普政府时期的变化。但我也认为，在应对当今中国时，美国与欧洲、亚洲盟友之间的牢固关系和联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很担心，拜登政府在与欧洲、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合作应对中国方面所做的努力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我刚刚漏提了印度，这是一个

更复杂的案例。与此同时，我担忧即将上任的新一届政府对美国盟友持更加负面的看法，这可能会削弱这种联盟的力量。

德：是的。那么你怎么看待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有报道称川普政府计划对中国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你认为，中国当前疲软的经济——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贸易战带来的压力——是否与此相关？如果美国不停止对华加征高关税，你是否认为中国可能会因此进一步削弱，从而引发更多针对政府的抗议和批评，甚至可能促进中国政治体系的自由化？

孟：我认为你刚才所表达的观点，即变革即将到来实际上是一种乐观的看法。

首先，我想明确表态，我支持对中国实施更高的关税。回到之前的问题，我并不赞成对欧洲及其他国家实施同等程度的关税。我认为中国应该被单独对待，理由是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其自身具有限制性的贸易政策。是的，我认为更高的关税对中国的影响将会非常显著。刚才我提到你持乐观观点，是因为我认为更高的关税以及经济疲软可能会在中国引发某种反应，但我怀疑这会导致任何深远的政治变革。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我遗憾地认为我们不会看到所谓的民主浪潮。我相信中国的安全体系极为强大，能够在抗议活动发展到相当规模之前迅速加以遏制。因此，这种影响可能会引发的是较小范围的变化，比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些情况，即党内高层对经济和金融领域人士的强烈反应。

此外，我想指出，最近关于这种可能性也有一些讨论。英国长期研究中国

问题的专家盖思德（Roger Garside）在两三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中国政变》（*China Coup*）。他预测，在上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些经济导向的领导人，比如李克强和王岐山，可能会推翻习近平，为民主铺平道路。然而，这种分析忽视了安全体系的力量。

更广泛地说，我们身处华盛顿或纽约，经常会接待一些与中国领导层有联系的中国访客，他们会暗示中国内部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我确信这种不满确实存在，但一些人由此推测习近平可能会被推翻，我认为这种看法太过牵强。

德：那么，你认为需要发生什么才能促使中国实现政治自由化或走向民主化？在当前的监控国家体制下，你认为有可能规避，或者对其进行拆解吗？

孟：我认为未来几年内不太可能发生什么实质性变化。这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低迷期以及民众极大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可能会在数年的过程中积累起来，从而促使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不满，不一定是上街抗议，而可能是小规模抗议活动、不去上班等形式。我很难清楚地描述这将如何发生，因为坦率地说，我对此持非常悲观的态度。

德：理解。自你出版《中国幻想》（*The China Fantasy*）一书以来，你是否注意到西方政策制定者或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你认为你的书对这些看法产生了影响吗？

孟：我的书是在 2007 至 2008 年出版的，当时它在美国受到主流中国问题专家的广泛批评。我认为大约花了 8 至 10 年的时间，人们才逐渐认识

到书中的两个主要观点是正确的。

第一个观点是，贸易、财富增长和对华投资并不会促成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在 2007 至 2008 年，人们仍然相信这一点。我记得，当时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奥克森伯格（Mike Oksenberg）曾写道，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可能最终会变得像日本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一样，通过民主选举维持执政地位，就像自民党长期在日本赢得选举一样。冷战结束后，许多人确实相信全球将不可避免地朝着民主化发展，这种信念与福山（Francis Fukuyama）关于“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密切相关。

大约 10 年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的书《中国幻想》。书中的另一个预测虽然关注度较低，但我认为同样重要，它出现在一个名为“谁在整合谁？”的章节中。这本书挑战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的普遍信念，即美国通过贸易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方式能够将中国整合进国际体系。我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中国可能正在实施自己的整合战略，推动专制体制的吸引力和经济激励扩展到其他国家。事实证明，这一预测也成为了现实。

德：你认为你的书对公众观点产生了影响吗？

孟：我认为在出版后的大约十年内完全没有影响，但之后影响显著。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曾在政府任职的人后来对我说，我当初的观点是对的。

德：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其试图影响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的做法，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孟：我认为，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表现十分突出，甚至可以说有相当大的成功，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国通过对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以及提供回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种现象甚至出现在体育领域，比如国际奥委会（IOC）。

在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影响力更加明显。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似乎不仅仅是基于科学，还受到中国政治权力的影响。

德：这很有道理。那么中国对这些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施加了哪些类型的压力？

孟：首先，中国对个别成员国施压，这种压力有时以经济回报的形式出现，有时则表现为对相关国家的贸易压力。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补充：中国在这些组织中展开了强烈的反美宣传。中国向其他国家灌输这样的观点：如果支持美国，就意味着支持霸权，而这显然不是其他国家希望被贴上的标签。

德：那么，如果将中国与 20 世纪的其他威权政权相比较，你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不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是否更有可能维持其统治？与苏联或其他经历过转型的独裁政权相比，中国有哪些独特之处使其与众不同？

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答案是，中国在经济上与国际体系的融合程度远超苏联。

即使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制裁以及一定程度的脱钩，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仍然规模庞大，而这只是美国的情况。德国经济几乎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也非常巨大。这种经济依赖使得与一个极权主义的中国打交道远比与一个极权主义的苏联更加困难。

德：是的，中国融入市场经济的程度的确带来了与苏联截然不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苏联当年处于军备竞赛之中，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苏联无法持续竞争，人民生活困苦，商店货架上没有食品。

里根发起的“战略防御倡议”（SDI）更是让苏联政府感到极大的威胁，因为这可能使苏联的核武库变得无效。最终是戈尔巴乔夫推动了“改革”（Perestroika）和“公开性”（Glasnost），从而引发了苏联的开放与改革。你认为类似的事情可能在中国发生吗？会不会在经济停滞或困难时期，政府内部出现一个同情民众的领导人，推动更大的自由化？

孟：理论上，确实可能。我认为如果出现一个全新的领导人，提出中国版的“改革”和“公开性”，确实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已经花费了巨大精力来确保不会再出现另一个戈尔巴乔夫。

这件事很有意思。过去 25 到 30 年间，中国一直在思考如何防止出现另一个“戈尔巴乔夫”。在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中国的答案是实行“弱领导人”政策，也就是胡锦涛时期的集体领导模式，以确保不会有强势领导人推动类似“开放”或“改革”的政策。

而后来，他们又进行了 180 度的转变。在习近平时期，选择了一个强有力

的领导人，确保其立场足够坚定，不会出现支持“开放”和“改革”的倾向。他的权力之强大，让他们无需再担心类似风险。

德：在习近平建立的监控国家下，如果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这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会有多重要？尽管国家努力控制信息、压制异见，但是否存在草根运动或替代性的公民参与形式，可能最终促成政治改革？

孟：很多关于民主化的理论是基于 80 年代亚洲国家（如韩国和台湾）的变化，以及东欧在柏林墙倒塌时的转型经验。这些理论普遍强调公民社会的发展。然而，中国的安全机构对此也非常清楚，并采取了极大努力阻止任何与政府无关的组织发展壮大。任何形式的街头抗议都会在萌芽阶段被扼杀。

此外，针对民间互动的另一部分控制是网络空间。中国的安全机构开发了高度先进的监控工具，以确保不会有任何在线组织的反对力量出现。他们利用 21 世纪的监控技术来防止公民社会的兴起。

话虽如此，我仍想指出一点：中国国内依然有人试图表达不满，有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比如，中国的防疫政策发生转变，就是从上海开始的年轻人上街抗议后出现的结果。因此，我不能说公民不服从行为，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公民不满”，完全不存在。我认为，这些行为确实存在，而且有时能够产生影响。

德：那么，对于那些来到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们接触到民主的

本质，这与中国关于“美国衰退”的叙事，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崛起”的论调完全不同。中国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退的霸权，而中国体制更优越，在技术发展上更有优势，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等等。

你是否认为这些人接触到美国的真实情况后，回到中国会推动某种变革？未来的领导者无论是在政府内还是在私营部门的重要岗位上，是否可能因为他们对民主有了不同的理解而对政治自由化产生影响？

孟： 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似乎非常强烈。他们依然相信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在当前美国民主显得格外混乱的时期，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带回对美国民主的积极认知。

让我稍微回顾一下历史，这种巨大变化是多么显著。我记得，当年我在华盛顿报道天安门事件后的情况。在那些事件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反对共产党的。那时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一场悲剧。

这种反对政权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在中国国内感受到，而且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也很强烈。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长达六到八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留学生游说美国国会，希望获得保护，不被迫返回中国。这也是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 第一次参与中国问题，通过努力阻止美国强迫中国留学生回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那些主张维持基辛格式中美关系的美国官员的论点是，他们希望这些学生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在美国大学和社会中看到了

民主，会成为推动民主与变革的力量。但实际上，我的观察是，仅仅两三年的时间，加上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强力努力，这种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仅用了两三年，中国就开始在美国建立爱国学生组织等。

因此，现在这种由党重新定义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使我看不到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在近期内会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变革的主要力量的可能性。

德：你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在倡导中国的民主价值观方面应承担哪些责任？

孟：我认为责任非常重大。每个政府的声音都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这种力量远远超过个人的声音。我认为他们需要为民主发声，为那些被监禁的人发声，无论是在中国大陆、新疆、香港，还是其他地方。

有趣的是，我不想显得像个老派的人，但新疆议题的影响力——尽管它完全正当且重要——却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西藏的现状。过去，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度较高，而对新疆的关注较少。

当然，我会将香港也列入需要西方民主国家发声的议题之中。我认为，欧洲和亚洲的民主国家有责任为言论自由、异议权利以及反对的权利发声。这不仅符合道义，也符合它们的自身利益。

德：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否应该因中国侵犯人权而对其实施制裁，还是仅仅对其进行谴责就足够了？

孟：我一直都这样认为，在特定情况下，有正当理由的制裁是可取的。

德：是的，我知道拜登政府对此也非常重视。特别是在新疆问题上，禁止由受压迫的穆斯林群体生产的新疆产品出口到美国。相关责任人被禁止入境美国，他们的签证被拒签，同时还受到制裁等。因此，也许这是一个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的战略。也许川普政府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但我们拭目以待。

展望未来，你如何看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未来 20 年中对其全球影响力的作用？

孟：目前来看，意识形态在世界舞台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正努力寻求民主国家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与合作。而以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代表的一组国家，基于部分反民主意识形态，正在形成一个相对松散的联盟。

当然，这四个国家的关系远不如北约或欧盟那样紧密，但它们至少在双边层面上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德：你认为中国是否在“两面下注”，一方面试图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同时又通过与伊朗、俄罗斯和朝鲜的联盟来对抗美国？

孟：或许中国有这样的尝试，但我认为它在与美国建立新关系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甚至也不抱太大希望。

举个例子，回顾过去几年，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习近平与拜登的会晤被炒得沸沸扬扬。我不认为无论双方如何宣传，这次会晤就能改变中美关系，

事实也确实如此。

德：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两国关系的紧张局势尤其明显。

孟：但我想说，你的问题是关于平衡的。我不确定中国本身是否认为它是在平衡与伊朗和美国的的关系。因为这两者及其组成部分彼此差异太大，我并不认为中国是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的。

德：鉴于中国在“中国制造 2025”及其他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中对研发的投资所取得的进展，你认为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领域，中国的雄心有多大意义？

孟：这确实很重要。回头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高兴中国宣布了“中国制造 2025”计划。因为这让美国和西方对技术感兴趣的企业和人们猛然醒悟。西方终于认真看待这一计划，终于理解了中国试图实现的目标。

德：是的，中国试图在这些特定领域取得领先，并投入巨额资金以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尤其是在美国广泛讨论实施“去风险”和“脱钩”政策的情况下，你对此有何看法？

孟：我认为最初的词是“脱钩”。

确实存在一些脱钩的现象，例如一些企业将制造业务转移到越南、东南亚或墨西哥。但这个词听起来像是美国所有企业都在撤出中国，并且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此，从欧洲开始，尤其是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开始, 包括美国在内, “去风险”这一较温和的词语开始流行起来。

去风险有其逻辑基础。比如我们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供应链的威胁, “去风险”这一概念显然更合理。当然, 脱钩的确在发生, 但从未走得太远。而去风险则稍微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进程。现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德国的普遍共识是他们对中国的依赖过度, 尤其是在汽车和化工领域。因此, 作为一个概念, “去风险”比“脱钩”更有意义, 也更容易被西方接受。

德: 是的, 但这也能保护美国, 防止向中国提供关键技术。即便这些技术在商业上有用途, 但它们可能通过军民融合转化为军事用途, 进一步挑战美国的地位, 甚至可能用于统一台湾。鉴于习近平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应在 2027 年 (解放军成立 100 周年) 前做好可能统一台湾的准备, 你如何看待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孟: 近年来的美国政策总体上倾向于对台湾的强力支持, 即使理论上仍维持“战略模糊”政策。我认为这种对台湾的强力支持政策会继续下去。不过, 我对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可能会如何影响这一政策有些担忧。

德: 是的, 考虑到台湾, 台湾生产了全球超过 70% 的芯片, 最先进芯片的生产比例更是达到 90%。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芯片供应。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形成威慑, 或者中国认为可以直接接管生产芯片的制造设施。你认为如果中国攻击台湾, 美国公众是否有意愿支持军事干预?

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可能会有支持，但我确实担心美国国内普遍存在的孤立主义倾向。

目前来看，这种倾向还是少数派观点，但它已经对乌克兰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就目前来看，新川普政府的对华团队引发的报道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对华鹰派”，这还有什么新鲜的吗？拜登政府的人也是对华鹰派。

让我回到台湾问题上，我感兴趣的是对华鹰派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中一种，我称之为“亚洲优先鹰派”。他们主张放弃对乌克兰的支持，整体上减少对欧洲的重视，将全部注意力转向亚洲，特别是确保台湾不被入侵。另一种则是常规的鹰派。

例如，新任国务卿本质上是出身古巴背景的反共人士。像马可·卢比奥 (Marco Rubio) 这样的政客并不支持与普京走得太近。这形成了一场围绕中国展开的有趣外交政策辩论。一方认为，美国应放弃或减少对欧洲的重视，集中精力保卫台湾；另一方，包括台湾人，则认为向中国发出这样的信号，即美国会放弃乌克兰，将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这也可能意味着美国可能放弃台湾。这是一场暗流涌动的激烈争论。

德：是的，那么如果中国发动攻击，你认为美国会直接派遣军队，还是仅向台湾提供武器，比如防御性武器，以防止台湾被大陆统一？

孟：不，我认为我们会直接对台湾提供军事支持。

军事专家会告诉你，这有一个两步战略。首先，美国需要向台湾提供足够

的武器，使其能够独立坚持几天，因为这将是美军部队、飞机和舰船到达台湾所需的时间。但我认为随后美军会直接介入。

德：你认为中国是否正在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有哪些挑战可能阻碍中国实现这一地位？

孟：我确实认为中国已经符合超级大国的条件。

鉴于其经济地位、外交影响力以及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中国目前可以被视为超级大国。我是说，如果苏联曾被认为是超级大国，那么中国也是。当然，中国的导弹数量相对较少，但总体上，我认为它已经具备超级大国的资格。而且，就在我们谈论的同时，中国正在加速发展更多的导弹能力。阻碍其成为持久超级大国的因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巨大的经济衰退，二是严重的内部混乱。

德：这很有道理。那么，对于美国而言，其目前的目标是阻止或遏制中国的崛起。现在中国的重点是成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希望成为一个能够以对其崛起有利的方式影响国际社会的全球性大国。美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遏制中国？

孟：我认为美国已经在应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可能性。

比如在南太平洋这样的偏远地区，中国的活动日益频繁。而作为回应，美国也在这些小岛上开设大使馆等。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在行动了。我认为，美国应该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更加积极地指出中国做法的问题。例如，“一

带一路”倡议及其带来的债务负担问题。

我想说，美国确实在做一些事情，但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防止中国在专家所谓的“信息空间”中占据主导地位。

德：中国被视为一个大国乃至超级大国，但有趣的是，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这种定位使其能够实施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扶持本土企业，直到它发展为一个真正的大国。

孟：你将这一问题归结为认知层面，即中国将自己视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认知的背后动因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身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我并不确定中国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些复杂，甚至有些微妙。在中国，民众普遍认为那些偏远的乡村地区或非沿海地区是发展中国家水平。我想他们大体上确实是这么看的。

但如果你问上海的人，或者随便挑一个沿海城市的居民，我认为他们根本不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人往往以他们的高速公路——即便有些路段车辆稀少——以及毫无疑问领先的高铁系统为荣，认为这些比所谓的发达国家还要先进。

德：确实，中国在技术创新和进步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对吧？它已经登上世界舞台，并在许多领域可以与美国进行全球竞争。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似乎通过多种方式复制了西方技术，例如通过黑客攻击、收购美国企业以及其国家主导的发展计划等方式窃取技术。中国在获得这些技术后对其进行开发和改进，比如高铁技术就来源于日本。中国通过与日本建立合

资企业学习技术，然后加以改进。这似乎是他们的一贯策略。那么，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中国这样做呢？有很多文章都提到，中国从特斯拉获取了大量技术，现在正在研发自动驾驶汽车。

孟：我认为美国应该阻止任何先进高科技向中国的转让。除此之外，我认为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借鉴日本的高铁技术并进行改进，这种事情是美国无法控制的。但美国确实可以在全新技术领域采取措施，比如人工智能等领域，限制这些尖端技术及相关技能和专业知识向中国的转移。

德：是的，这很重要，尤其是在关键技术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这些领域成为领导者，它会有哪些优势？如果他们开发出比美国更先进的技术，这会在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中国在计算、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比美国更先进，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的发展？

孟：我还没有对此深入思考。毫无疑问，中国会向世界宣称自己是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并且会表示：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为你们提供美国无法提供的东西。我认为，从象征意义上讲，这将使中国能够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自我呈现。

德：是的，中国可以不再遵循全球标准，而是制定全球标准供其他国家遵循。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技术战争。

孟：确实已经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但具体细节我并不完全清楚。不过，我曾在美国 - 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任职几年，该委员会一直关注中

国试图影响全球标准以及制定这些标准的国际机构的努力。

德: 好的, 我的问题差不多就这些了, 非常感谢你接受采访并解答这些问题。

孟: 谢谢!

(此访谈用英文进行, 由余浩风博士译成中文)



黄奕信画作